

百年中华 文学中的 台港文学

陶德宗 著

巴蜀书社

百年中华文学中的
台港文学

陶德宗 著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陶德宗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03.4

ISBN 7-80659-454-x

I. 百... II. 陶... III. ①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研究-台湾省、香港②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研究-台湾省、香港 IV. I2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535 号

.....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封面设计 易 阳

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

陶德宗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

电话:(028)87445573

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00 千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200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ISBN 7-80659-454-X/1·169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台港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序《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

吕 进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并且提出了庙堂文学、民间文学和广场文学的理念。其实，无论庙堂文学也好，民间文学也好，还是广场文学，都有一个南北文学的问题。南北文学，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文学的“风骚”的两立式结构就是。从文化看，南北之分也很明显。音乐的“南风”、“北风”（“南音”、“北音”）；绘画的“南宗”、“北宗”；书法的“南派”、“北派”；服饰的“南冠”、“北冠”；南方美学思潮的飘逸，北方美学思潮的崇高等等。

南北问题，是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要课题。这里不但有中国古代的中央王国文化与文学和方国文化与文学的问题，更有区域文化与文学的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文化一源说”成为学界共识：黄河文化从来被认做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但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证明，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比如说，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燕赵地区、江浙地区都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黄河文化自身也分为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更是将中华文明向前推了两千年。“两岸三地”文学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半个多世纪里的不同的政治制度，给“两岸三地”文学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金庸说，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中心去征服四面八方。中国的情形很不相同。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然后，许多文化向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凝聚。区域文学是有明显差异的文学。反过来，区域文学又施加影响于整体文学。就像学者钱穆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说的那样：“埃及、巴比伦、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具备一个摇篮，只能长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她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育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与小家庭的独养子不同。”

我们说的南北文学，实际上都局限于大陆文学。如果将眼光放开，将大陆文学作为一个整体，那么，“两岸三地”文学也是一个放大的南北文学。所以，在我看来，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构架是东—西—南—北。东与西，是整体的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本体意义与民族身份的寻求；南与北，是多元的中国文学的区域性与价值负荷的体认。

“两岸三地”文学从破裂走向整合，成为时代的潮流。中华文学的整体性，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一些现当代文学史不再局限于大陆文学，而是放开眼光，以“两岸三地”

为关照对象，也面世了一些研究台港文学的专著。同时，一些高校也陆续开设了台港文学课。

“两岸三地”的文学显然是具有同构性的文学，这是研究台港文学的一个必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台港文学研究就会是一个伪科学。台港文学不是别的，而是中华整体文学图谱中的文学，是中华文化框架内的同质文学，具有相同的血缘与遗传。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三者的融合是绝对的，正如差异是相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两岸三地”的文学又彼此具有异于他者的差异性，它们都有自己的“集体无意识”，自己的“文学遗传”。无论是地理环境、语言风俗，还是性格特征和文化心理，“两岸三地”的文学都有自己不同的内在气质和外在特征。在“两岸三地”文学研究中，南北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的逆现象，就是一个相当有趣、相当有意义的课题。从50年代开始，大陆与台湾的文学围绕一个中心在逆向中展开。50年代的大陆文学以现实主义为旗帜，台湾文学则是以现代主义为主潮。到了70年代末期，台湾文学由现代派思潮转向，传统思潮重新成为主流。而大陆的文学思潮刚刚相反。从70年代末期开始，大陆文学的思潮急剧转向，放弃传统，复写西方现代派成为时髦，“从零开始”成了一些大陆文学家对待传统的流行观念。几十年间，大陆和台湾文学总是各自向对方错位。这是一个很值得考察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整体文学的发展路向。

应当说，现在对东与西的研究大大多于南与北的研究。在南与北的研究里，近年出现了一些台港文学史，这些文学史可以看做是“重写文学史”理念的原质性延伸，也出现了一些台港文学的研究论著，而后者面临的任务更复杂。区域文学的文学遗传在

与整体文学的融合中，一定有变异，有了变异，才使融合成为可能，研究者一定不能将“文学遗传”固定化、僵硬化，将这固定了的僵硬了的“文学遗传”作为研究的惟一内容；也一定有保持，有了保持，才能不在融合中丧失自己，研究者一定不能对区域文学的特质有丝毫忽略。有的著作有独到之处，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有待加强的范畴。

2002年5月，在韩国汉城举行了中语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在开幕式上做了主题讲演，这篇讲演稿，刊在今年第五期的《文学评论》上。在讲演里我提出，中国新诗研究有三大不足，台港诗歌研究不够深入是其中之一。说的是诗歌，其实文学亦然。

我很高兴地读到陶德宗先生的《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一书的手稿。德宗在学校开设这门课已经有十好几年，很受大学生欢迎。读完全书，我感觉，这本书是台港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

应当说，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于我都不陌生。两地的文友很多，从两地寄来的赠书赠刊也几乎每周都有。我还应邀担任台湾一些文学刊物的名誉编委。台湾诗人薛林先生出资3000美元在中国新诗研究所设立了“薛林怀乡青年诗奖”。出访时我常常经过香港。1998年、1999年我还两次奉中国作家协会之派，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访台，走遍台湾全岛。在诗歌界，我似乎被认为是个“台港通”。但是读了德宗的大著，我感到了自己对台港文学了解的浅薄。德宗的著作占有了丰富的材料，我很佩服他的治学精神。《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出发，以时间为经，文学潮流为纬，对上起1895年下迄2002

年的日据时期、光复时期和当代的台湾文学以及香港文学进行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多维度的打量，在方法论上也多有新的突破，给人留下不凡印象。

德宗是我的老朋友，对于此书的问世，我愿向他表示诚挚的祝贺。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	(1)
第二章 中华文明光耀台湾	(18)
第三章 锲而不舍的对台经营	(25)
第四章 源源不断的大陆移民	(38)
第五章 风情迷人的台湾民间文学	(45)
第六章 台湾旧文学的辉煌与蜕变	(65)
第七章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悲壮历程	(77)
第八章 台湾作家的“鲁迅情结”	(105)
第九章 台湾新文学的民族之魂	(124)
第十章 台湾新文学的现代意识	(144)
第十一章 光复初期文学的艰难首航	(159)
第十二章 台湾文学的当代流变	(180)
第十三章 泛滥一时的反共文学	(193)
第十四章 充满悲情的怀乡文学	(199)

第十五章	探索前进的现代派文学	(212)
第十六章	痛苦寻根的漂流文学	(225)
第十七章	回归传统的乡土文学	(231)
第十八章	东方情韵的女性文学	(247)
第十九章	别样风流的通俗文学	(256)
第二十章	多元并进的文学潮流	(262)
第二十一章	世纪之交的热血呼应	(269)
第二十二章	中华民族与东方之珠	(296)
第二十三章	维多利亚海湾的新文学浪潮	(307)
第二十四章	香港文学的当代景观	(341)
第二十五章	香港文学的一枝独秀	(350)
第二十六章	严肃文学的千姿百态	(357)
第二十七章	紫荆花在新世纪飘香	(368)
第二十八章	面对全球化的中国文学	(392)
后 记		(417)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

在 20 世纪末期，为打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人们曾致力于纵横两个方向的开拓：横向的开拓是，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密切联系，寻觅中国现代作家风格形成过程中的外来因素，以求真实再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本质；纵向的开拓是，运用整体的研究方法，把中国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于是有“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整体观的形成。这纵横两个方向的开拓，对打破过去的封闭状态，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建设新的研究格局，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要真正打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把握更加切合历史实际，仅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整体性。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也即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空间架构。具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并非单由大陆现代文学构成，而是一个以大陆现代文学为主流，以台湾、香港现代文学和

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前的东南亚侨民新文学为支流的综合体系。要考察这一整体观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就得把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广阔流域，认真审视台湾、香港现代文学、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前的东南亚侨民新文学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之间是否形成了一种支流与主流的本质关系。

一、中国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

生发于中国本土空间之内的中国台湾现代文学，上起 1920 年“新民会”的成立和《台湾青年》创刊，下迄 1949 年大陆解放，跨越了日据时期和光复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由于这 29 年的台湾现代文学运动，有 25 年处于殖民地社会环境之中，因此，要看台湾现代文学是否是中国现代文学一支流，关键得看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是否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属性。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在祖国“五四”运动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全力推动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前夕，由于日本殖民者在继续用武力镇压台湾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更倾力推行以灭绝台湾人民民族意识为目的的文化同化，致使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在此时的台湾表现得尤为惨重。“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正为台湾人民民族解放之路而苦苦求索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们既为祖国母亲终于以觉醒之姿昂然站起而激动万分，更从中体悟到了台湾人民应走的正确道路。于是，他们立即从祖国大陆接去了“五四”火种，在长夜漫漫的台湾岛上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熊熊火炬，照亮了台湾人民回归祖国

的民族解放之路，并由此催生了台湾的新文学运动。

在“五四”风雷声中呱呱坠地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便自觉认定了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关系：“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1]在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生死相搏的斗争中，台湾新文学对自己方向路线的这种毅然抉择，集中表现了台湾新文学创作主体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祖国情结。这种思想情感，作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强韧的内驱力，从根本上保证了它必将高扬起“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弹奏着启蒙与救亡的主旋律，朝着求民族解放与新生的根本方向愤然前行。

纵观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特定的殖民地社会环境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紧迫需要，虽使其特别高扬起了“五四”新文学精神中反帝爱国的一面，成为“代表台湾居民反奴役心声的台湾秀异分子壮烈的抗议运动”。^[2]但由于其创作主体是一群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既要反帝救国又要改造社会人生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之火为他们所炼就的“火眼金睛”，使他们对封建文化在殖民地社会环境中助纣为虐的帮凶性质有着十分清醒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台湾人民的反殖斗争，既是争取回归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是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如果不在坚持反殖斗争的同时，彻底批判助纣为虐的封建文化和清除民族自身精神上的污垢，那么非但不能求得民族的解放和新生，而且连这场斗争本身也不可能坚持下去。由于这种思想认识的内在驱动，因此，把反封建和批判愚弱的国民性纳入反殖的基本母题之中，并由此引导人们在“五四”新文化精神层面上的觉醒，便

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基本特征。如赖和对阿金（《可怜她死了》）悲剧的描写，就深蕴着这种自觉的创作追求。阿金是个善良的女子，但在殖民统治和封建文化势力的双重威压之下，她始终未能争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在她那少小不能为人女，长大不能为人妻，怀孕后不能为人母，最终凄惨死去的悲剧形成过程中，罪恶的总根固然在残酷的殖民统治，但我们也清楚地看见了从历史纵深处延伸下来的封建家长制度、“养女”制度和蓄妾制度等，是怎样在协同着殖民统治把一个弱女子一步步逼上死路。赖和在深刻揭示阿金悲剧形成的社会政治原因和历史文化原因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她的思想性格与其悲剧之间的因果关系。阿金是善良的，但同时又是愚昧软弱、隐忍从命的。正是这愚昧软弱、隐忍从命的主导性思想性格，使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非人待遇皆取默默承受的基本态度，直到临死时对这冷酷的人世也无任何怨恨。这种病态的灵魂，可悲的性格，无疑正是阿金悲剧形成的内在原因。

和赖和一样，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作家在描写台湾那被血泪泡着的土地和人生时，皆始终坚持从殖民统治、封建文化势力以及人们自己的病态灵魂这几个方面来深刻揭示其悲剧形成的原因，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既内蕴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努力写出他们的血和肉来”的清醒深刻的现实战斗精神，^[3]又形成了鲜明的思想启蒙特色，并深刻地寄寓了创作主体对病态社会中的不幸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态度。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一支流的本质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新文学，人们多将其划入台湾新文学的当

代时期。事实上，这种划法与此时台湾新文学的实际表现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虽然形成了台湾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界碑，但将海峡两岸联系起来看，光复初期台湾新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又与大陆国统区文学完全相同，理应归入 40 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统区文学之内。从此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本身来看，以许寿裳为代表的大陆作家和以杨逵为代表的台湾作家汇聚台湾文坛，其活动的重心主要是两点：一是对祖国大陆新文学特别是鲁迅思想精神的介绍传播，二是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与总结。共同的目的是推动海峡两岸新文学的直接交汇。在创作上，由于多数台湾作家正面临着由日文向中文的艰难过渡而并不活跃。少数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其作品仍多是描写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题材、主题等诸方面皆表现为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香火的承传。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等作品，虽属此时台湾新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出现的新因素，但从是时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之，这类批判讽刺国民党“接收大员”丑态、表达台湾人民失望和不满情绪的作品，又只能归入同期国统区文学中批判讽刺现实的创作潮流之内。由此可见，光复后四年的台湾新文学并未出现划时期的变化，它与大陆新文学的交汇，仍是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时期”这一段河道之内。

从 20 年代初到 40 年代末，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实际雄辩地表明，它始终是以支流状态随着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而发生和发展的。尽管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它在某些方面与母体文学形成了差异，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始终与大陆新文学一脉相系。其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本质关系正如台湾新文学史家所说：“台湾新文学运动是直接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发生的，它始

终追随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之倾向，可以说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支流。”^[4]

二、中国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

对香港，人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文化沙漠”。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当代香港的实际，也有违新中国成立前的香港真实。早在20年代中期，香港爱国青年便开始了对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自觉呼应。1927年，香港进步青年热情邀请鲁迅赴港讲演。尽管港英当局把鲁迅以《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所作的讲演视为“异端邪说”，并干扰讲演会于前，禁登讲演稿于后。但通过这次活动所表现出来的香港爱国青年对民族新文化的向心力，以及它与“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对位效应却是十分明显的。就在鲁迅赴港讲演后第二年，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即告问世。在此之后，《红豆》等十多份新文学刊物又相继于30年代初前后出现。至此，香港新文学的潮流性趋势便告形成。香港当代著名评论家黄维梁也认为“在三十年代，香港的新文学可以说形成了”。^[5]

和台湾现代文学相比，香港现代文学与祖国大陆现代文学的直接联系交往更为紧密。早在香港新文学初创之时，许地山、欧阳山、杨晦等大陆作家便或奔赴香港，实地参与香港新文学活动，或将自己的作品投往香港新文学刊物上发表，以实际行动支持了香港新文学的初期建设。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战乱的环境和国民党政府对民

主运动的血腥镇压，迫使大批大陆作家南下香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两个时期内，先后来港的大陆作家便有茅盾、夏衍等一百多位。众多大陆作家与本港作家的汇合，再加上“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共香港“文委”等组织坚强有力地组织领导，香港人民特别是出版发行部门的热情支持，遂使这两个时期香港的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皆呈一时之盛，并成为是时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战场之一。仅从文学创作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不少名篇佳构便是在这两个时期的香港文坛上诞生的。究其主要，便有出现于抗战时期的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许地山的《铁鱼的腮》，肖红的《呼兰河传》、《马伯乐》，戴望舒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出现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茅盾的《锻炼》、黄谷柳的《环球传》、吕伦的《无尽的爱》、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夏衍的《劫余随笔》、聂绀弩的《二鸦杂文》、陈残云的《珠江泪》等等。以这些作品为代表的香港文学，充分高扬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和清醒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应和着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定时期的时代节奏，有力地显示了香港现代文学与大陆现代文学的同质同步同向性。

正因为香港现代文学的两度高潮主要是由大陆来港作家推动而成，所以有人便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并没有什么独立的香港文学存在”。^[6]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合乎香港现代文学历史实际的。如前所述，早在抗战以前，香港便已经形成了以本港作家为主体的新文学运动。其后的两度高潮，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与发展而不是中断。众多大陆作家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加入了香港新文学作家队伍，但他们毕竟流动性很大。在香港现代文学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为香港新文学建设而努力不懈的，